

胡伟希著

传统与人文

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

中華書局

传统与人文

——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

胡伟希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吴 杰

传统与人文

——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

胡伟希 著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 9¹/₄印张 • 218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6.60 元

ISBN 7-101-00904-2/K·373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港台新儒家概述	1
一、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
二、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内涵及特点.....	11
三、简论：成败得失之间.....	25
第二章 钱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意识	31
一、历史和文化.....	31
二、中国文化之特质——性道合一论.....	46
三、中庸之道.....	52
四、人生价值论.....	58
第三章 唐君毅：中国的人文精神	75
一、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	75
二、儒家文化与宗教精神.....	84
三、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	97
四、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民主.....	106
五、儒家心性论与道德修养.....	119
第四章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	129
一、从西方哲学进至儒家学术.....	129
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道德性.....	144
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152
第五章 徐复观：儒家人性论	170
一、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	170

DK47/08

二、从性到心——孟子的人性论	181
三、论孝道	191
第六章 张君勱：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205
一、新儒家的道德哲学	205
二、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220
三、儒家思想的复兴	230
第七章 方东美：生生之德	241
一、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	242
二、原始儒家的思想来源	249
三、“生生之谓易”	261
四、儒家道德的基础	270
附录：港台新儒家生平及著述	286

第一章 导论：港台新儒家概述

这里所谓的“港台新儒家”，乃兼有一特定的时间和地域的概念，它指五十年代以后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发展起来的一股以复兴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思潮及其人物；既不包括五十年代以前在港台地区的儒家文化思潮，也不包括1949年前后一直在中国大陆上的新儒家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其外延，应小于现在一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大多数港台新儒家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以后迁往香港、台湾。尽管这批学者们前后有其一贯之旨——坚持以儒家为本位的思想立场，但其思想体系的完成和成熟，却是五十年代以后之事。自然，“港台新儒家”并非一个十分严格的科学概念；港台新儒家们治学方法师承不一，思想观念亦非一致，与其视其为一个思想派别，毋宁说它代表在港台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思潮更为恰当。个别学者，如张君勱，1949年以后迁居美国，但其思想的影响在港台，且其著述文字大多在港台的报刊上发表，故这里仍将他归入“港台新儒家”。本书论列的港台新儒家有六位：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方东美。究其实，新儒家思潮影响于港台思想界、学术界甚大，具有新儒家思想或称许其观点者决不限于此六人。以上所举，仅为港台学术界一致公认为对学术、思想界之影响至深且广之“莘莘大者”。且从六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发展来看，他们的新儒家观点大多于1949年以前在大陆时即已形成，而到港台后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产生重大影响，此与晚后一代“港台新儒家”（这批人基本上受此六人思想的影响，

且多为此六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上殊有差别,故本书所列的港台新儒家,实为此一思潮的开山人物——这是在港台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儒家思潮,其思想内涵及所关注的问题显然与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上的新儒家思想大有差别。然而,这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它同近代以来新儒家思想的历史联系与渊源。

一、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港台新儒家”形成于五十年代的香港、台湾,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至本世纪二十年代甚至更早。中国的儒学独尊启自汉武帝,二千余年一脉相沿下来,直至晚清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近代以来一系列的历史巨变,始发生动摇,而其中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扫荡为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思潮洪水似地涌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大震动、大波涛;人们,尤其是青年对西方新思想的追求相当地执著和热烈。实用主义思想一度称霸于中国思想界的舞台,此外,还有各种的新思潮、新主义,如生命哲学、生机主义、逻辑实证论、新实在论、唯物辩证法……等等。然而尽管在西方思潮强劲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未完全熄灭,至少它还是学问造诣很高的极少数学人们的一种信念。这当中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等。1921年,正当国内“西化”之风鼎沸、反儒家运动达到高潮之际,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公开揭橥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书中宣称:“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

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以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痛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①梁漱溟思想的要点是提出文化即生活路向或人生态度说，认为中西文化之异不是历史阶段的差别，而是所选择和采取的生活“路向”的不同，他提倡复兴中国儒家“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就思想影响而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但从书的内容上看，其对传统哲学的钻研却不十分深入，更多的表达的是作者的一种先知式的预言和洞见。真正对中国儒家思想之复兴确有理论上的建树且产生深邃久远之影响者，数熊十力。故熊十力方可称为严格意义的现代中国儒学复兴的第一人。

熊十力，字子真，湖北黄冈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为辛亥元老；但其兴趣不在政治而在学术，且目睹辛亥以后社会风气的堕落及官场的腐败，转而闭门著述，埋首于学术研究。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先后在北京、南京、重庆等地讲学，并招徒授业。著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等等。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微探幽，深得慧解，在当时的学术界可谓独树一帜。然熊十力是一位纯学者，二十年代以后即脱离政治，在书斋中度过一生，其思想除为少数学生理解和传承下来之外，在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界影响不大。1923年，正当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之际，熊十力即开始于其思想体系的建立，十年以后，其代表作《新唯识论》一书问世。与梁漱溟相似，熊十力亦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由佛归儒”的过程。然梁漱溟以宏观的视野对儒学复兴的

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页。

前景作了鸟瞰,熊十力则致力于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本身之建立,故《新唯识论》特以理论架构之完整、系统和精密而著称。其思想理路乃首从方法论入手,说明儒家学术自有不同于佛学、西方哲学之所在:“佛家生灭不生灭折成二片……西哲则实体与现象终欠圆融。《新论》确救其失……脱然超悟吾人与宇宙本来同体,未尝舍吾心而求体于外,其学不遗思辨,要以涵养为本。求心、养心与扩充心德之功日密。(孟子云求放心,又云养心,又云扩充,并与佛家归本唯心有相近处。但孟子之学本于易,无趣入寂灭之弊。)去小己之私而与天地万物同于大通,直至内外浑融,始于当躬默识天德,方信万有根源不离吾心而外在,何劳向外推寻哉。此是与西洋学者天壤悬隔处。”^①然熊十力思想之核心在承认“良知”乃当下的呈现,为一真实体,此一学说继承了儒家中陆王心学的传统。他认为儒家学术乃“心性之学”。这种心性之学,牟宗三又称之为“生命的学问”。五十年代以后,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港、台一带弘扬新儒家精神,乃直接熊十力思想而来。

三、四十年代,除熊十力以外,对中国儒学的重建有贡献者还有冯友兰、贺麟。冯友兰早年受西方新实在论影响。抗战期间,著《新理学》、《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新世训》、《新事论》等“贞元之际六书”,将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相结合,构造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自述其思想承宋明理学而来。几乎与此同时,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等书,从新黑格尔主义出发,会通陆王心学,试图建立“新心学”思想体系。此二人思想在当时学术界均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冯友兰,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哲学家。但究其实,冯、贺二人之思想虽着眼于中西哲学之会通,然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

① 《新唯识论》(壬辰语体文本)页6b—7a。

诠释,仍多从西方哲学之理路出发。真正从中国哲学出发融会、消解西方哲学以建立中国哲学之体系,此条路并未正式打通。

以上梁、熊、冯、贺四人,可谓现代新儒家思潮发展之第一期的代表。中国儒家本位之哲学研究向纵深的发展,乃在五十年代以后。1949年以后,一批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迁居香港、台湾。其中既包括在大陆时即颇负盛名的名学者如钱穆、方东美等,亦有涉入学术界不久,尚未为世所重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当时唐、牟、徐都只四十岁或四十余岁,其重要著作均到港、台以后发表,此与钱、方老一代学人稍有差别)。港台新儒家思潮,乃这批学人处于港台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而形成。

如果说在大陆时期,现代新儒家即已出现,那么何以直至五十年代以后,儒家复兴会在港台地区高潮迭起呢?原来,在港台新儒家们,无论前辈学者或晚进后生,绝大多数都对政治、时风和世事极为关心之人。他们在大陆从事学术活动之时,就自觉地将其学术生命与时代脉搏及政治联系在一起。如方东美在抗战初起时,就曾通过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青年宣讲《中国先哲的人生哲学》,鼓舞全国青年的抗战热情。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抗战初期即创办杂志,既论文化,又议时政。如果说港台新儒家们在抗战期间都曾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鼓励全民的抗日斗志的话,那么在四十年代末尤其五十年代迁往港台以后,尽管他们各人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颇为不一,但在基本原则,都对国民党丢失大陆表示不满。他们尝以明末清初的遗老自居,试图总结历史之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固多端,这当中包括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变质;但倘若从文化学术上反省,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之风难逃其咎。港台新儒家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或表同情,或主批判,态度不一,但从思想文化入

手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却达到一致的认识。可以说，港台新儒家们热衷于宣扬儒家文化的复兴，就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此一政治背景实为一重大动因。这点，唐君毅在《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说得清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所提倡之科学思想与自由民主思想，诚是自西方输入，并非承清代精神而来，亦本当是反马列主义者。但是只讲自由民主，而不在人文人格之观念上立根，又不能形之于政治制度，则自由民主之口号，亦将只有破坏打倒已成之社会政治力量之用。提倡科学，而不重实际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只以科学方法逻辑分析技术，作为批判传统文化或恫吓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之用，则科学之口号，亦无助于中国文化之发展。而同可为反人文的马列主义，征服中国之拥趸先驱者。这些都可说是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征服中国大陆之文化思想上的一些缘因。”^①故当时的港台新儒家们一度热心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几乎一致地对西方文化采取全面否定或激烈批评的态度。他们所言的西化，不仅指新文化运动以后输入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化，还包括随西风以来的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牟宗三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暗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还不止此，又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这一个歧出是一个轩然大波，是一个大逆转。”^②他们从逻辑上推论说，新文化运动吹开了“全盘西化”之风，而全盘西化又导致“俄化”。于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评和否定，成为这一时期港台

①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② 《生命的学问》，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新儒家们的重点文字。

除了针对国民党失去大陆有感而发以外，港台新儒家们醉心于中西文化的讨论，还有港台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港台地区近代以来就处于欧风美雨侵袭的前沿。自国民党政权迁台及大批学者迁居港台，中西文化的冲突更为尖锐。一般而言，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大多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习，在思想倾向和社会风气上，都追求和向往“西化”。港台新儒家中人，其思想观点在大陆时即已形成，尽管其中不乏对西方学术、文化有深入钻研者，如方东美等人，但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他们更主张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因而，在港台社会上、思想文化界乃至学术界，中西文化的论争不息于耳，其规模和深度为1949年以前大陆上所少见。这当中，既有新、老一代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的对立，亦有价值取向、治学方法不同所形成的学派上的对垒（如从大陆迁台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殷海光等人即在思想上与港台新儒家们长期对立并爆发过争论）。而在这持续的、大大小小的文化论战中，港台新儒家们一直处于论争的中心或前沿。因此，他们之极力提倡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就现实意义之层面说，主要又针对港台地区的“西化”之风和“全盘西化”论者而发。方东美在他的一系列讲演中，将这一想法表达得很清楚：“我平常有一句很得罪人的话，就是我在台湾大学里面教了二十几年的书，在这里面真正的中国文化根本没有！就是有，分量也非常之轻！就国文这一方面来看，试问现在国文系，能讲中国的经学、子学、史学的人有好多？或是对于清以前各朝代鼎鼎大名的文学家的文集，谁能够称心乐意地看，而看了能够了解欣赏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在哲学这一方面，许多大学所编订的课程，都是把西洋摆在第一位，甚至很多时候连印度哲学的分量都超过中国哲学的分量。试问在这个情形之下，如何可以训练一个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来发扬中国

哲学智慧，而这个哲学智慧的内容是真正从中国哲学里面孕育出来的？”^①又说：“我们可以知道过去五十年来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根本就成了问题，前三十年学日本，后二十年学美国。我们没有独立的教育理想，更没有自己的教育政策；不只忘记了人内在伟大的心灵，更不了解自己的艺术文学与哲学。结果台湾的大学几乎都成了留美预备学校。许多美国大学并不及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但某些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去美国后却进了第三、四流大学，然后才勉强进第二流的大学，浪费了许多学习机会和学习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危机就是‘忘本’。在这里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诗歌、中国的音乐几乎没有，即令有，分量也很轻。”^②

以上两点：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检讨以及对港台地区“西化”之风的反击，构成五十年代港台新儒家倡导儒家文化复兴的最初动因和历史背景。然而，三十多年来，港台新儒家思潮历经流变，本身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大体上说，这一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十至六十年代——港台新儒家思想的酝酿、形成时期。此一阶段，港台新儒家们忙于创办刊物、杂志，以及各种文化研究机构的建立，以求联络声气、相互支持。如1950年，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杂志，并在台北设分社；同年，钱穆、唐君毅等人在香港筹办新亚书院，后又办新亚研究所。它们以后都成为复兴新儒家思想的主要阵地。此外，他们还与港台的一些报刊联络。如香港的《华侨日报》，三十多年来一直为徐复观提供发表文字、议论的论坛。此时，港台新儒家在港台思想文化界尚未取得主流地位，在社会上影响亦不广。其中不少人被人们视为思想守旧、政治保守之人。在学术思想上，他们重点放在对中西文化的

① 《东方美先生演讲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7页。

② 《东方美先生演讲集》，第209—210页。

宏观比较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反省上,故又可称之为“文化热”或者致力于“文化哲学”的建立的时期。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期。经过前二十年的努力奋斗和苦心经营,“新儒家的复兴”在社会上开始不再是与“保守”或“守旧”联系在一起的名词。尤其是它在学术界开始赢得声誉,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反响。至今,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已远超出港台,而迅速发展 to 东南亚各国、南朝鲜、日本以至欧美。这一世界性的反响也许非港台新儒家们始料所未及。然不能不说,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就有在世界文化中重振中国哲学的雄心(见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四人1958年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只是事态发展之快出乎港台新儒家们之意料而已。个中原因多端,如港台以及亚太地区华语文化区经济崛起的奇迹,引起欧美世界对这一地区文化背景的注意和研究;旅居、游历欧美的华人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其中不乏港台新儒家们的学生和热心传道者,等等。抛开这些外界机缘不论,港台新儒家们在后十多年中踏踏实实地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他们一方面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和素养,另方面又有西方哲学、文化的识力和方法的训练,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价值的中国哲学的专著和文章,将融会中西文化及哲学的蓝图初次展现,不能不是至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1964年夏威夷第四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上,方东美宣读《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一文,并驳斥英国学者芬里教授对中国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看法,引起与会代表极大兴趣。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大会发起人查理·摩尔教授说:“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英文介绍禅学,风行欧美的九十二高龄的日本铃木大拙博士说:“本届东西哲学会议所有发表的论文,当以方先生大作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不愧精心结构的压卷之作。”英国

牛津大学麦克慕兰教授称赞：“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文之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之于当世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历史性的转变是在六十年代末。有关资料表明，大多数港台新儒家从文化哲学转向更具体的学术性研究，是1969—1970年间的事情。这种转变殆非偶然：一方面，中西文化的讨论，必有待于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研究才能深入，这当中自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从另一方面说，六十年代后期，港台地区的经济开始“起飞”，为从事学术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较安定的环境；同时，国民党反攻大陆无望，再侈谈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历史的陈述，于是港台新儒家们的“政治”热情消减，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术本身的问题上来。此外，在社会上，尽管西化之风仍日甚一日，但毕竟有相当一批社会人士对学术、文化问题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对传统文化并非一概排斥。而这其中的一个插曲是1967年7月开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表面上是一项民间组织和推动的活动，实际上有国民党官方支持和作为后台，其宗旨在向全社会宣传、介绍中国儒家文化。运动的“推行委员会”编印了大量读物，并利用官方掌握的报刊、电台等宣传媒介传播有关中国文化的讯息。尽管这是一项染有政治色彩的半官方的“文化运动”，但对港台新儒家们的思想在港台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少学校、文化团体相继邀请他们讲学和演讲。在这种情势下，港台新儒家们也预感到儒家文化复兴最佳时机的来临，于是，如何致力于中国本位的哲学体系之建立，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热点”。我们看到，港台新儒家们研究的重心从六十年代末开始转移，到了七十年代，代表他们思想体系的作品纷纷问世。这中间可举出者有：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哲学概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方东美的《中国之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等等。

八十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这一方面由于港台新儒家中主要人物的相继去世（以上六位港台新儒家人物中，除张君勱去世稍早，在1969年；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均于1980年前后逝世；钱穆于1990年去世，目前硕果仅存者为牟宗三），另一方面，文化思潮的地域转移是一无可避免的事实。如同港台新儒家思想发端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一样，随着港台新儒家思想的远播以及其弟子们的流迁世界各地，当今新儒家思潮已有转移到港台地区以外的亚太地区以至欧美之势。然而，作为一种思潮，“港台新儒家”并没有消逝。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活跃于海外的倡导儒学复兴的劲旅（夏威夷是一个中心，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天普大学的傅伟勋等等），他们绝大多数是港台新儒家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其学术思想不仅一脉相承，且许许多多的学术观点和看法，仍不超出乃师范围。可以预见，随着港台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海峡两岸学术交往的增加，如同港台新儒家思想已经在海外产生强大影响一般，新儒家思潮亦必将从港台及海外回流大陆，对大陆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事实上，近几年国内一些大学和学者已开始加强对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研究，不能说它同港台新儒家思潮的影响全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港台新儒家思潮的研究实为目前学术界极为迫切的一项课题。

二、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内涵及特点

如前所言，“港台新儒家”并非严格的学术派别，而代表一种儒学复兴的思潮；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渊源既有差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亦不完全相同。至于儒家文化应如何复兴，中西文化和哲学如

何融合……等等问题,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同一个港台新儒家,前后思想的差异也很大,或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回答和说明)。然而,港台新儒家作为五十年代以后出现和流行于港台地区的社会文化思潮,无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各位港台新儒思想的个体特征如何,却共同地关心如下问题,并从新儒家的思想立场作出了大致相同的解答。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扎根的问题。

港台新儒家们普遍对当前中国文化的衰微和江河日下感到焦虑。他们承认,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已经一蹶不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学说不仅再起不到昔日那种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甚至连作为学术研究的科目亦颇遭冷遇,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故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实有被连根拔除之势。早在1950年,唐君毅就这样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前景的忧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常有一同一之感触;即此传统文化已经衰微,我亦常如此想。但是一个更深的反省,却启示我以一更深的问题,即所谓中国文化已衰微,不足应付时代,是什么一种意义。是否中国文化精神,在现在全不存在了?这似乎很容易作肯定的答案。我们试看,不要说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文化之色彩,在由消褪而进向虚无。在学术上,科学几全是西方来的。哲学,则数十年来之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现在中国之地位相较,至多只到平分秋色。在宗教上,基督教的社会势力,已远盛于原有的佛教道教。在文学艺术上,中国之最特殊,而为过去社会普遍宗尚之一种艺术——书法,首被忽视。音乐中之七弦琴,连买亦无处买。元明的水墨山水画,试问几多人能欣赏?连建筑中最代表中国精神之回廊,飞檐,牌坊,亭子,重门深院,与园林,试问几多人能感其意味无穷?中国式的学者,政治家,